

“互联网+”语境下中国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

Film Adaption Based on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文 张宗伟 /Text/Zhang Zongwei

摘要：互联网兴起，为文学和电影搭建起更为便捷的互动渠道和传播平台，开启了电影改编文学的新征程。“互联网+”正在改写文学和电影的本体，它拓宽了中国文学名著的外延，为电影改编增加了海量的内容资源和受众，带动文学的电影改编从制作到传播的全流程再造，为中国电影产业赋予新动能。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代表的古代文学的电影改编，在“互联网+”语境下进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积极探索，为提升新时代中国电影文化竞争力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互联网+” 文学名著 电影改编

文学和电影的本体建基于不同的媒材之上，以文字和影像为核心形成了文学和电影两种不同的艺术种类，它们按照各自的轨迹前行，看似交集甚少，不过文学的电影改编搭建起文字和影像跨界交流的桥梁，二者在语言和逻辑上相互交融互补，在过去一百余年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大批文学名著改编而成的电影作品跻身于影史经典之列，文学的电影改编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课题，产出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互联网的兴起导致文学和电影的本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两者之间的互动也因此愈加紧密，在“互联网+”语境下，文学的电影改编面临更为复杂的新语境，改编实践不断拓展，改编观念不断创新，“互联网+”语境下文学的电影改编研究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一、“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和电影

(一) “互联网+”时代的文学

与诞生仅仅百余年的电影相比，文学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在互联网尚未出现的漫长“网前”时代，文学曾与时俱进，在形式和内容方面不断创新，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清代以前，中国文学文体的迭代和演进之迹尤为明显，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各领风骚，虽然各代文学之文体差异甚巨，但是自文字出现之后，代代相传的各类文体的内核并无二致，流传至今的都是以纸媒为载体的“书面文学”。清末民初的文学改良运动结束了以文言为主的古典文学，而新起的白话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仍然是“书面文学”，直到20世纪中叶，非线性书写的电子“超文本”诞生，才彻底颠覆了传统“书面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方式。通过电子媒介生产和传播的“超文本”彰显并放大了传统文学潜在的开放性、离散性和互文性等特征，互联网的普及助推当代文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网络时代此起彼伏的“超文本”生产浪潮中，最引人瞩

目的是网络文学的兴起和飞速发展。⁽¹⁾

西方网络文学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汉语网络文学的起步比英美网络文学要晚十多年，“萌生于海外华人的汉语网络文学对中文网络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有着筚路蓝缕之功”。⁽²⁾1991年，北美留学生主办第一家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上面刊载了少君的《奋斗与平等》，被公认为是最早在网络发表的中文小说。1998年，蔡智恒(痞子蔡)在台湾成功大学BBS上开始连载《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随后被转载到大陆各大BBS，使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第一本中文网络小说”。1997年底，美籍华人朱威廉创建“榕树下”个人主页，催生了李寻欢、宁财神、邢育森等第一代中文网络作家。2000年，今何在创作的《悟空传》获得“榕树下第二届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最佳人气小说奖，开辟了中国网络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取向，即从东方神话、西方奇幻文学中汲取营养，从而奠定了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的根基，提升了网络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概而言之，与传统文学相比，上述所谓网络文学具有作家身份网民化、创作方式交互化、文本载体数字化、流通方式网络化、欣赏方式机读化等新特征，随着网生代受众群体的不断扩大，到上世纪末网络文学渐成与传统文学分庭抗礼之势。

进入新世纪，中文网络文学迎来爆发式增长，据统计，2018年国内主要网络文学网站的驻站创作者已达到1755万人，其中签约作者61万，全职作者占比

* 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硕士钟萌晓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亦有所贡献，特此感谢。

(1) 网络文学方兴未艾，它的内涵和外延尚未完全确定，其概念仍在争议和生成之中。本文所谓网络文学是指以互联网为创作平台和传播媒介，以网民作为创作主体，以文字作为主要表现手段，原创发表供网民免费(或付费)阅读的新型文学样式。

(2) 欧阳友权主编《网络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38.1%。2018年各类网络文学作品累计达到2442万部,较2017年同比增长48.3%。其中,签约作品达129.1万部。2018年网络文学读者总计达4.3亿人。⁽³⁾在近二十年的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一方面是网络文学产出作品几何级数的年增长量;一方面是中国网络文学创作类型的不断细分,从最初单一的幻想题材,走向题材多元化,目前已有玄幻、都市、奇幻、仙侠、现实、历史、军事、科幻、言情、青春等诸多大类,这些大类下面分列的亚类又有二百多个,当下中国网络文学创作之繁盛由此可见一斑。

互联网为传统文学提供了高效的传播平台,加快了书面文学名著的普及速度,为传统文学的电影改编搭建起更为便捷的互动渠道。网络文学的繁荣,则培养了大量潜在的电影观众,为新时代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海量的新鲜内容资源、超过4个亿的庞大的网络文学读者群、年均超过两千多万部的网络文学作品。“互联网+”给新时代中国电影改编带来的不只是便捷的互动渠道和传播平台,也不只是受众群体和改编对象的量的激增,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思维对文学的电影改编从制作到传播的全流程再造。

(二)“互联网+”时代的电影

电影诞生百余年来,其发展与现代科技息息相关,技术进步成为电影艺术理论创新和美学革命的重要支撑。电影与技术、与媒介的关系极为敏感,技术和媒介的每次变化,都会引起电影生成、存储、发行、放映和接受方式的改变,从而导致“电影”本体爆发周期性的本体论危机。毫无疑问,数字技术是继声音和色彩之后,电影领域最具革命性的技术进步,比之于前两次技术革命催生的有声电影和彩色电影,数字电影从制作工艺、制作方式,到发行及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胶片的时代基本终结,影院也不再是电影传播的唯一平台。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革新了传统的“影像”观念,而数字化浪潮的涌动和互联网的兴起,则不只冲击着“影像”本身,更对电影创作的全流程乃至整个电影行业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互联网+”正在全面改写传统的电影创作观念,仅就电影创作的核心电影叙事而言,互联网的兴起就引发了传统电影叙事观念的裂变。“互联网+”将传统的电影叙事从封闭的单一故事文本导向了跨媒介跨文本的混杂叙事体的编制,不同媒介的叙事文本彼此协作,共同构建起具有超链接性和互文性的“故事世界”。20世纪90年代出品的《低俗小说》(1994,美国)、《两杆大烟枪》(1998,英国)、《罗拉快跑》(1998,德国)、《女巫布莱尔》(1999,美国)等,以非线性、互文性、跨文本、游戏化等迥异于传统电影的叙事手法,开启了电影叙事的新时代。此后AR、VR等各种数字互动叙事类型兴

起,“电影”的叙事和观影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质变,传统的电影叙事模式已不能满足互联网时代电影创作的需求,必须进行范式创新以适应新的时代语境。

不仅如此,“互联网+”还正在颠覆电影产业原有的运作模式,从创意、融资、制作到营销、发行、传播以及后产品的开发,互联网都无处不在。比如众筹和平台融资等新的投融资方式的出现,网络文学IP改编带来的多元化的创作素材和新的影片类型,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线上宣发,在线选座、预售系统的开发,网络购票的普及和网络影院的出现,等等。从最初电影“+互联网”的物理反应,到近年来“互联网+”电影的化学反应,互联网不只是被简单视为电影发行放映的新渠道和平台补充,而是渗透到电影行业整个产业链之中的创新思维。近年来,以BAT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巨头进军电影业,将众筹、电商、大数据挖掘等互联网商业模式与电影产业深度对接,助力中国电影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二、名著改编电影的新观念

(一)对文学名著的再认识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文学名著的外延基本明确,最无争议的中国文学名著自然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古代文学经典,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构成部分,也一直是中国电影改编最可靠的优质内容资源。就现代文学而言,“鲁、郭、茅、巴、老、曹”诸公的作品,也是公认的经典文学名著,它们在不同版本的文学史著中都占据着显赫位置,成为电影人十分青睐的改编对象。中国现代以来畅销的通俗文学,尽管它们初起时读者众多,一度流布甚广,但是其文学价值却是见仁见智,艺术成就尚待岁月的洗礼和沉淀,最终能否成就文学经典名著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民国初期盛行的通俗小说、最有代表性的如徐枕亚的《玉梨魂》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程小青的《江南燕》为代表的侦探小说,以及蔡东藩的《历朝通俗演义》历史演义等,在新旧文学交替的时代,占据了当时中国大众文学的大部分市场,张恨水、刘若云等言情小说大师异军突起,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刘云若的《春风回梦记》《红杏出墙记》等力作,不仅雅俗共赏,且有一定的写实精神,极大地提升了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

上述通俗小说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国内主流文学史所忽视,在有的史著中明显地被轻视甚至是被敌视。然而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对现代通俗小说的认识也

(3)《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 http://www.sohu.com/a/333280198_120052253

在变化，它们在文学史中所占的篇幅越来越大，对其评价也越来越高，只要对比一下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就会发现文学界有关现代通俗文学评价体系的巨大变化。⁽⁴⁾这类通俗小说往往诞生不久便成为电影改编追逐的对象，其中的优秀之作还穿越时空，被不同时代的电影人改编或翻拍，比如上文提到的《玉梨魂》，它在1912年问世后成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扛鼎之作，几年内数次再版，创下了当时畅销小说销量的最高记录。1924年，张石川、郑正秋将小说《玉梨魂》改编为同名电影，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的经典。1939年和1953年，《玉梨魂》又两度被香港影人改编成电影，成为鸳鸯蝴蝶派小说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以言情和武侠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创作几乎绝迹，对历史上通俗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因而改革开放之前通俗文学被排除在文学名著之外，在国营计划经济主导的电影生产体制下，通俗文学作品也无缘成为电影改编的对象。⁽⁵⁾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琼瑶、三毛、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港台名家作品的引入，琼瑶热、三毛热、武侠热此起彼伏，带动了内地通俗文学创作的复苏，不过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伤痕”“寻根”“反思”“改革”等严肃文学占据主流，本土通俗文学创作依然处于探索阶段。9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电影产业化进程加速，互联网兴起，中国通俗文学进入了高速发展的繁荣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俗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热，二是网络文学兴起及其电影化改编热潮，由此也带来了通俗文学价值的重估和通俗文学外延的扩充。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网络文学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的生力军，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网络文学的爆发式增长确实带来了通俗文学的繁荣，但是片面追求流量和粉丝放大了网络文学的娱乐功能，却更加弱化了传统文学所注重的社会化功能、道德教化功能和审美功能，并由此影响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生态和价值导向。2014年，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大潮中迷失方向，及时将新时代网络文艺引领到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

谈到中国文学名著，不能不提到“红色经典”文学，其源头至少可以上溯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产生的“延安文艺”。赵树理和丁玲等人在解放区期间创作的小说，以及贺敬之等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等，可视为“红色经典”的滥觞。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期间，出现了“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以及《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洪湖赤卫队》《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等一批红色主题的作品，“十七

年”由此成为“红色经典”文学的高产期。⁽⁶⁾“红色经典”在其诞生之初尚未来得及经典化，经过了“十七年”时期和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两次大规模电影改编，“红色经典”得名并逐渐成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红色经典”的传承、重构和再造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红色经典”的电影改编依然在路上。

(二) 新时代文学改编电影的新动能

“互联网+”语境下关于电影改编最引人瞩目的话题之一当属IP。大约在2011年前后，BAT等互联网巨头相继推出“泛娱乐”战略，试图构建联结文学、影视、游戏、动漫、音乐等跨领域、多平台的互动娱乐新生态，IP概念随之浮出水面，许多高人气的网络小说和通俗文学成为电影争相改编的IP，如《寻龙诀》《九层妖塔》《小时代》《匆匆那年》等改编成电影上映后，不断刷新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成为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前几年通俗文学电影改编的实践来看，有三类故事成为电影市场欢迎的IP：一是冒险与悬疑类故事，代表作是由盗墓题材小说《鬼吹灯》改编而成的《九层妖塔》和《寻龙诀》。改编者借助电影工业的力量与数字特效，将小说描述的玄幻情节可视化，传播了本土化的故事与视觉文化，形成了较有特色的中国魔幻片风格。二是“架空现实”的爱情故事，代表作有《杜拉拉升职记》《小时代》等。这些故事的目标受众是白领阶层与大学生群体。影片极力呈现童话般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目的是为现实中的中产阶级打造完美的神话，改编者将小说中本属虚幻的生活更加美化，成为红尘中人超脱世俗生活的视觉慰藉。三是被过度消费的青春故事，代表作有《匆匆那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左耳》《摆渡人》等。这类故事打着怀旧的旗号，对接的是70后与80后观众的成长经验，通过怀旧的空间与陈设，展现一段曾经逝去的校园往事与职场经历，引发观众共鸣。

通俗文学IP改编的盛行是电影产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对于激活中国电影市场发挥过积极作用，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商业化为电影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内容基础，影视、游戏、动漫、有声、出版等IP转化不断放大网络文学边界效应，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

⁽⁴⁾ 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⁵⁾ 刘知侠、曲波、李英儒和刘流等人创作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等，尽管在创作中借鉴了民间文学的手法，具备通俗文学的某些形式特征，但是其高大上的革命主题和红色基调掩盖了“通俗文学”的形式，因而被整合到“十七年”红色经典的文本序列之中。

⁽⁶⁾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包括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等八部小说作品。

响力。但随着各类制片机构疯抢网络小说，一大批质量低劣的所谓 IP 严重挤占电影编剧的原创空间，加剧了电影市场的泡沫化，引发了业界的激烈争论。2015 年底，在名为“原创与‘IP’相煎何太急”的编剧论坛上，阿里影业某副总裁称阿里影业拍戏将不会请专业编剧，而是采用杀人游戏的方式来让“IP 的贴吧吧主和无数的同仁小说作者 PK”写故事，最后择优录取，此论点遭到许多知名编剧的强烈批评，从而引发了要原创还是要 IP 的大讨论。经过一段时间论战，业界基本达成共识，即盲目追捧 IP 甚或以 IP 取代原创，只会抹杀电影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破坏中国电影的生态，长远来看，必将危害中国电影市场的良性发展。

通俗文学 IP 改编热遇冷之后，文学的电影改编亟需寻找新的动能。2015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文化产业”，并提出了“重在建设和发展、管理引导并重”的方针，推动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剧、微电影、网络演出、网络动漫等新兴类型繁荣有序发展。《意见》明确了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网络文艺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有力地推动了新时代网络文艺和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随着政府管理力度的不断加大，相关文艺团体发挥了强有力引领作用，一方面使得网络文学努力向主流化、经典化靠拢，另一方面业界也将电影改编的重点从通俗文学转向了经典文学名著。

三、《哪吒之魔童降世》： 文学名著改编电影的新探索

得益于新时代主流文化的及时引领，近两年来，古典文学重新取代通俗文学，成为电影改编的主流。在悬疑、言情和青春等题材的网络通俗文学 IP 改编热退潮之后，经典文学电影改编的回归和强化，契合了新时代提升文化自信的内在需求，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下文简称《哪吒》）为代表的古代文学的电影改编，进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积极探索，为提升新时代中国电影文化竞争力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哪吒》于 2019 年暑期档上映，目前国内票房已经接近 50 亿元（统计至笔者截稿之时），超越年初上映的《流浪地球》46 亿元票房，成为国产电影内地票房榜的新科亚军。不仅如此，在国产电影总票房榜前三甲中，《哪吒》在豆瓣的评分为 8.6 分，远远超出了《战狼 2》的 7.1 分和《流浪地球》的 7.9 分。由此可见，《哪吒》的确称得上是一部票房口碑双赢的佳作。一部现象级的作品，居然出自于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的创作团队之手，它的导演饺子还是一位学医出身、半路出家的 80 后电影人，这看似打破常规的创作神话，却自有“互联网+”语境下中国电影发展的合理逻辑。

伴随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天然带有“互联网+动漫”文化基因的年轻电影创作群体正在崛起。他们在互联网上看视频的时间，远远多于去影院看电影，所以更习惯于类似 B 站这样将二次元产品进行互动分享和二次创造的文化社区的接受语境；他们基本上不是学习影视专业的科班出身，因而不讲究经典叙事模式和视听语言的陈规俗套，却对当代影视动漫常用的好莱坞式的英雄成长、作者风格的黑色幽默、网络段子式的戏谑无厘头等创作套路了然于心；无需刻意迎合，他们就能对接“互联网+”商业语境下主流受众的价值取向、审美需求与偏好的社会议题。《哪吒》的改编者，正是“网生代”电影创作者的代表。从古典小说《封神演义》到新版电影《哪吒》，年轻的主创团队为我们提供了“互联网+”语境下中国文学名著改编的成功案例，相较于此前众多描写“哪吒”的影视动漫作品，2019 动画电影版《哪吒》最大的特色是互联网思维贯穿了改编的全过程。⁽⁷⁾

首先，《哪吒》的主题表达与原著有了很大的不同。小说《封神演义》的主旨偏向“伐纣”的宏大叙事和“宿命论”，主题先行使得书中的人物形象较为单薄，各路人神基本上是概念化和符号化的存在，他们的出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作者预设的道德或宗教“使命”。书中哪吒因是灵珠子转世，三教钦定的伐纣先锋官，所以仗着标榜“正统”的太乙真人的庇护，无论是对待敖丙还是石矶娘娘弟子都是赶尽杀绝，肆无忌惮。原著站在“伐纣”的道德高地“赦免”了哪吒的过度暴力。而在《哪吒》中，原著宣扬的命由天定的宿命观被改写为“我命由我不由天”“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算”，于是哪吒不再是一个被空洞所指绑架的符号，而是不受命运摆布、充满了顽强抗争精神的独立个体，他的暴力不是借“宿命”之名滥杀无辜，而是在自由意志驱使下对“魔丸”之邪恶宿命的顽强反抗。电影的改编者顺应了互联网自身的运作机制、传播特性以及用户人群明显的去中心化、去宏大叙事的倾向，《哪吒》所张扬的反叛精神，正好契合了互联网“平民化”和“草根逆袭”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上的亲和力才是真正打动年轻观众的杀手锏。

其次，根据网络受众的观影心理，《哪吒》重设了《封神演义》的核心人物关系，并将其作为线上宣发营销的重要生长点。小说原著中最核心的人物关系是“李靖—哪吒”互为仇敌的“父子”关系，这一重要的人物关系设定被此后的众多改编之作所沿袭，基本没有出现过颠覆性的改变，而在《哪吒》中，核心关系由父子关系迁

⁽⁷⁾ 哪吒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明清神魔小说中十分活跃的经典形象，主要记载于元代宗教神话典籍《三教搜神大全》，在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南游记》和《封神演义》等都有登场，其中《封神演义》描写哪吒故事的篇幅最长、线索最完整、形象最成型，因此本文所指的《哪吒》改编的原著主要是指《封神演义》。

移到了“哪吒—敖丙”的“兄弟”关系，两人视觉配色一红一白，互为镜像，同为命定之子却性格迥异。由一开始的青涩纯真到后来的互为仇敌，到最后同仇敌忾，成为惺惺相惜的命运共同体，《哪吒》的核心故事由此升华为一部少年英雄的成长史。年轻化的人物设计，十分契合“互联网+”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以“90后”“00后”青少年为观影主体的人际关系模式，所以得到大量年轻人的共鸣，哪吒与敖丙亦敌亦友的“兄弟”叙事，呼应了年轻网民热衷于探讨的“CP”话题。

第三，在淡化《封神演义》原著小说宏大的政治、历史议题的基础上，《哪吒》在改编时给电影引入了互联网时代流行的全新社会议题。数字传播与移动互联网技术开启了一个虚拟与现实交互的多维文化空间，互联网的强社交属性加剧了用户身份的“群落化”和议题的“圈层化”，现实社会中流行的女性议题、种族议题和职场文化议题在网络空间中也有相应的“群落”和“圈层”，因此《哪吒》在改编时也为原著中单调的符号化人物进行了全新的角色定位。比如将哪吒之母打造成斩妖除魔的事业型女强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女性议题的代言人；龙族与申公豹的悲惨境遇，则暗示着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的议题；而原本仙风道骨、法力无边的太乙真人，则变成了说着四川方言的胖子，他是醉酒渎职的天庭“公务员”，也是教授“熊学生”的师父和“老师”，这个滑稽可爱满身笑点的形象，显然也与时下流行的职场文化议题密切相关。《封神演义》中最为惊世骇俗的哪吒剔骨还父并追杀父亲的情节，在《哪吒》中被转化

成互联网上有关“熊孩子与家庭教育”的热门议题，同时创作者还进一步将这一议题置换成“安全系数”极高的好莱坞家庭情节剧的温情叙事，原著中剔骨还父的决绝变为“还没有与爹一起踢过毽子”的亲情留恋，“父亲”的召唤与“家庭”的回归使得《哪吒》变成了多重文化语境的复杂叠合，一度弥散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这巧妙的改编中实现了银幕复归。

结语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电影作为新时代中国最具活力的文艺形式之一，承担着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责任，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大文化使命。《哪吒》等作品的成功表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电影最可靠的文化根源。如何有效利用电影艺术这一载体，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如何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有效提升中国电影的创作质量和文化软实力，助力中国由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跃升，这些都是新时代文学名著改编需要直面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互联网+”使文学和电影在共同繁荣社会主义网络文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更高平台上找到了新的契合点，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也因此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文化使命。

（张宗伟，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100024）

新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的电影改编刍议

On Film Adaption of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since the New Century

文 刘思佳 /Text/Liu Sijia

提要：新世纪以来，我国古典文学的电影改编稳步发展，尤其是从2008年开始，伴随着影片数量和总体票房的提升，我国古典文学电影改编进入新时代。总体而言，这些电影的导演多集中在香港，题材集中在《西游记》等少数经典，显示出古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仍有许多创新的空间。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主要分为复写式、框架式和自由式三种类型。新时代我国古典文典的电影改编，应重点追求创新性和创造性的艺术转化。

关键词：电影改编 古典文学 类型 创新

文学是文化的典范表征，文化是电影的灵魂写照。我国的古典文学经典是当代电影艺术和电影产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电影创作与生产，需要统筹考虑文字与影像两种媒介、古代与当代两种现实，通过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挖掘电影改编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本文尝试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考察新世纪以来我国古典文学经典电影改编的总体情况，在此基础上从艺术性和创新性的角度总结电影改编的创作规律和类型分